

六朝文学丛论



◎◎

胡德怀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六朝文学丛谈

胡德怀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六朝文学丛谈

胡德怀 著

☐责任编辑 谭晓萍

☐责任印制 文桂武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5-115-X/I·001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作者简介

胡德怀，湖南省攸县人，1933年生，中共党员，1960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攸县一中和攸县师范学校的中文教师和教导主任。1974年11月至1978年在攸县县委宣传部、攸县文教局工作。1980年12月至1984年11月任攸县教育局副局长。1985年任攸县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1984年11月至1996年11月任湖南省株洲教育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并兼任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主要科研成果：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和傅璇琮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本图书的部分编撰工作；先后在《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齐梁文坛与四萧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本。

七 律

读胡德怀先生《六朝文学丛谈》有感

自古论六朝文学者，无不毁多誉少。独胡德怀先生以非凡之学力，确凿之论据，严密之论证，论定六朝文学为辉煌之文学，其胆识之过人，观点之新颖，材料之扎实，令人感佩万分。特作七律一首，以抒读后之情。诗曰：

自古文坛贬六朝，
空虚乏味气萧条。
倚红偎翠诗宫体，
颂德歌功舞醉雕。
赖有先生澄晓雾，
幸无金帛屑荒郊。
森林树木两相见，
朗月清辉耀九霄。

范进军

甲申季冬于湘潭桐子坳

序 言

六朝文学概念所指：两汉、魏晋、南朝、北朝，即现在通称的汉魏两晋南北朝文学。这概念肇自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

鲁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段文学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材料较少，在文坛上比较寂寞，比不上唐诗、宋词、《红楼梦》那般辉煌。唐朝人和宋朝人，提起“六朝文学”，多是指责，即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愈：《荐士》）这段文学也不像某些领域那样，存有许多“珍秘材料”，或忽然发现某些“重要文物”（至少目前如此），所见的都是人所常见的书典或材料。因此，对这段文学的研究，需要学力、勤奋和积累，需要识力、思维和贯通。正如古人所说：“学而有识，识而能通，是所谓学问。”

《六朝文学丛谈》一书从篇目可知基本构架：以六朝文学为主线，着重论述六朝文学中的主要作家，如王粲、曹植、萧衍、鲍照、陶潜等；仔细评述六朝文学中的主要作品，如《汉赋》、《文心雕龙》、《诗品》、《文选》、《汉乐府》等；宏观阐述六朝文学中的主要文学现

象，如诗、歌、赋、骈文、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等。作者力图点、线、面有机结合，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20 世纪 60 年代，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尔后，在攸县、湘潭等地从事中等、高等教育和县文教局领导工作。90 年代初，又以国内访问学者身份，学研于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所，师从郭预衡先生等。我治学沿袭清人朴学路子“无征不言，言必有据”，崇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然世上万事万物，做和想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我这种学浅历少的人，更难完成自己多年的夙愿。我权以此书作为学研中国六朝文学之始，并期在抛砖引玉，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胡德怀

2005 年 6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章	刘邦的《大风歌》	
	——读古典名诗	(1)
第二章	项羽的《垓下歌》	
	——读古典名诗	(3)
第三章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读二十四史之祖司马迁的《史记》	(5)
第四章	魏有“三曹” 梁有“四萧”	
	——为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作	(12)
第五章	试论汉乐府诗歌	(25)
第六章	润色鸿业的汉赋	(34)
第七章	建安之杰曹植	(45)
第八章	试论王粲赋	
	——汉赋研究之一	(55)
第九章	传承文明 沟通未来之《文选》	
	——试论《文选》的实际编辑与选文标准	(69)
第十章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80)
第十一章	阮籍诗和嵇康文	(84)
第十二章	桃花源里可耕田	
	——论桃花源诗与记	(94)

第十三章	江淹的《恨赋》和《别赋》·····	(100)
第十四章	才秀人微的鲍照及其诗歌·····	(105)
第十五章	南北朝民歌概况及其比较·····	(112)
第十六章	永明体与谢朓·····	(120)
第十七章	六朝小说举隅 ——《搜神记》和《世说新语》·····	(135)
第十八章	“体大而虑周”的论文大成 ——刘勰和《文心雕龙》·····	(141)
第十九章	“思深而意远”的论诗之集 ——钟嵘和《诗品》·····	(165)
第二十章	论齐梁文坛三派之消长·····	(183)
第二十一章	试论文学家萧衍·····	(198)
第二十二章	试论萧纲的诗文及其创作 ——兼说宫体诗·····	(212)
第二十三章	再谈萧衍散文的艺术特征·····	(229)
后 记	·····	(241)

第一章 刘邦的《大风歌》

——读古典名诗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击败淮南王英布，天下已定，衣锦还乡，置酒沛宫，邀父老故人痛饮。酒酣，刘邦击筑，慷慨伤怀，自为歌，并令故人同唱，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作为一位马上就要得天下的开国君王，《大风歌》正是他英雄本色的写照。诗中既有对往昔“风起”、“云飞”戎马生涯的追忆，又有对今日天下已定衣锦还乡的无限感慨，还有期求“猛士守四方”的深沉思谋。23个字将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王的复杂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如何“守四方”？刘邦思考的结论是：仍需“猛士”人才。在他居位的12年中，命丞相萧何“取秦法之宜于时者”制定《九章律》；命陆贾等大批谋臣总结秦失天下之原因，进而采取轻徭、薄征、慎刑等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措施，形

成了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的局面。

《大风歌》汉人称《三侯之章》，与项羽《垓下歌》同为乐府楚声。一个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徐缓沉雄威猛有力；一个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石破天惊八面威风。两个英雄各自用自己的性格、方式、才略演绎了历史，而后互相佐证。如果说《垓下歌》是一首失败英雄的悲歌，那么《大风歌》则是一首成功英雄的欢歌。一悲一欢，方向相反，但深层的感情却是相同的：两诗都是描写帝王兴衰的心态和气象。不同的是：一个是英雄自刎，一个是雄主登基。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大多是如此演绎发展。

历代千秋，人事沧桑。从昨天看今天，《大风歌》给后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第二章 项羽的《垓下歌》

——读古典名诗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汉军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夜闻四面楚歌”,项羽惊疑自己的根据地全为刘邦占领,于是慷慨悲歌,与虞姬诀别,歌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阙,美人和之”。(见《史记·项羽本记》,下同)据《楚汉春秋》有虞姬和诗:“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此诗我怀疑为后人的伪作,不足为据。

“诗贵真”,“诗是性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垓下歌》充分表现了英雄末路的悲哀,流露了为宿命论所支配的英雄心声,反映了项羽真性情及其阳刚之美:明明是“力拔山”、“气盖世”,到头来却徒唤“可奈何”?“奈若何”!明明是“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到

如今却落得个“四面楚歌”。当乌江亭长停船劝他过江为王，项羽坦然笑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乃自刎而死。”项羽的死闪耀着远古英雄主义人格的光辉。《垓下歌》可谓“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真性情的诗歌，真英雄的项羽！

失败的英雄，英雄的失败，深憾人心。正如李清照所写的《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霸王别姬》这曲戏代代相传，久唱不衰。

历史无情，悲剧崇高。项羽的可悲不仅是霸王别姬，更可悲的是英雄至死不悟失败所由。正如太史公所言：“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仍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对“天”的崇拜，对命运的屈从，在生产水平低下的远古，项羽似应可原谅。而今信息社会，人们可以翱翔太空，探索人类第四环境的奥妙，而我们某些人仍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种宿命论所左右；街头巷尾的算命先生，尚不乏其人。这种历史的反差，岂不发人深思！

第三章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读二十四史之祖司马迁的《史记》

楚汉之争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就是总结“秦所以失，汉所以得”，以及历代兴亡之迹。从贾山、贾谊开始，直到董仲舒，凡所立论，大抵不出这个题目。争谏中最切题的文章，是贾谊的《过秦论》，它明确提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而董仲舒则从天人感应观来解释盛衰循环之理。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由此可见，《史记》之作，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总题目下所写的大块文章。

当然，司马迁本人就如《史记》一书，具有独特的个性特点。

首先，身为世代史官之后，又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之时，司马迁可以说是当时最渊博的学问家。由于当时学术还没有完全定为一尊，他不仅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而且还能兼采诸子百

家从而集其大成；不仅占有前人所不曾有的文献资料，而且具有后人所难有的“自由思想”；不仅运用资料，大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发表主张，还可以纵意而谈，无所顾忌。

其次，司马迁是史官世家，却又是个受了腐刑而满腹牢骚的侍从之臣。他之所以作史，始则接受其父的遗命，后则主要有“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知，司马迁虽是朝廷的命官，但他与朝廷的历代史官不同：虽身居史职，而所述则是半是正史、半是野史，半是官书、半是谤书。这样的著作真可谓空前绝后。鲁迅谓之“史家之绝唱”并不为过。

最后，中国的历史、文学，在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严格的公开。司马迁虽写历史，而笔端常带感情，所谓“退论书策，以舒其愤”，这是前代史书所罕见，后代史书所难能的。所谓“无韵之离骚”，也很贴切。

二

谓之“绝唱”，理由如下：①这是集先秦、汉初之大成的文史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②结构之完整，体例之严密，也是空前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已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

确是“史家之极则”(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班固引述前人说的“不虚美，不隐恶”，是一部“实录”。这可以说不仅是空前的，而且，至少在现在，是绝后的。

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前也有官方的良史，如董狐；有私家的笔削，如孔丘。但孔夫子的“虚美”和“隐恶”，曾是公开的笔削原则。一部《春秋》，虽然不能就称“断烂朝报”，但至少可以说并非“实录”。董狐号称直笔，但晋灵公已经“不君”，本来该死，而在他的笔下，却一定要书“赵盾弑其君”，实在迂腐。

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后，还有哪一部可称“实录”的呢？继司马迁后的第一个重要历史家是班固。当班固奉命修史之前，曾因“私改国史”的罪名被关进监狱，那么，出狱之后写的《汉书》，其小心谨慎，就可想而知。最后，还有一个想著“汉史”而未被批准的蔡邕。王允曾公开宣称，不能让人们像司马迁一样作“谤书”流传后世。刘知几所谓“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迂”，“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这话不仅概括了唐代以前，也概括了唐代以后。二十四史之中，没有一部可同《史记》的“实录”相比的。

司马迁的“放言无惮”与“实录”，主要不是在于他上论古代，而在于他论述当代；不在于他写古代史，而在于他写近、现代史，即武帝以前的近百年史。而在近百年史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写顶头皇帝，即汉

武帝。写的时候，不是“山呼万岁”，而是揭露事实。汉武帝是个英主，同时也是昏君。司马迁一方面写他雄才大略，指出“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值得赞扬；而另一方面，又揭露这个帝王在人生大欲已极的情况下，还要长享人间富贵。《封禅书》写他妄图长生不死，甘心受骗上当。对于顶头皇帝揭露到这个程度，是后代史家所不敢的。

三

关于屈原的《离骚》，鲁迅曾说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关于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又说是“无韵之离骚”。那么，司马迁之作《史记》，是否和屈原之作《离骚》具有同样的情绪呢？

司马迁的为人，不同于蒯通、主父偃，他没有他们那样的纵横气；也不同于董仲舒、公孙弘，他也没有他们那样的儒生气；但是他却比较接近于屈原和贾谊。他对于国家，乃至对于主上，原是忠心耿耿的。对于统治者的批评暴露，也是同屈原相似。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刘知几说：“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史通·载文》）由此可见，《史记》一书，从其思想情绪看，是和《离骚》有其相通之处的。

首先，一个因人成事的刘邦作了皇帝，一个才能出